

太湖渔稻文化述论

李 勇

太湖自古有“震泽”、“雷泽”、“笠泽”、“具区”、“泽薮”、“五湖”等名,“太湖乃五湖之总名”^①,是一个庞大的水系。本文的“太湖”是指扬子江以南五大湖群组成的“太湖水系”。太湖文化从产生至今已经逾1万余年,是有史以来太湖流域的民众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的总和。太湖文化是太湖流域的文化母体,经过万年的融合、创新,嬗变出了吴文化、苏文化、海派文化、金陵文化等子文化。

—

距今约20—30万年前,太湖流域最早的先民是汤山直立人^②,也被称为“南京猿人”。距今约10万—1万年是第四纪冰期的最后阶段——大理冰期,今太湖流域的海面下降,从太湖湖底的黄土层推断,距今20000—12000年。目前发现的太湖流域最早的文化是“三山文化”,即“三山岛旧石器文化”,距今约10000年前。此后,太湖流域历经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等新石器文化时期。

距今9000—7500年,全新世中期初,太湖流域气候一度转暖,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太湖流域大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③。

距今7000—6000年间,太湖流域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据吴县草鞋山的考古发掘,此时的太湖流域属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圈。

距今约6000—5000年,太湖流域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覆盖的是崧泽文化。根据考古材料,此时太湖流域的生产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石器制造普遍采用穿孔技术,磨制精致。在镇江丹徒磨盘墩出土的打制细石器,以石钻为主,据专家推测,这些细石器可能是制作玉器的工具^④。崧泽文化晚期出现了石犁,长宽20公分左右,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犁,表明此时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已有明显的发展。

距今约5000—4000年,太湖流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

期,为良渚文化覆盖区。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制陶技术比崧泽文化有明显的进步,良渚文化的手工业制造品的陶器中,泥质黑陶是主要品种,还有圈足陶器、三足陶器、鱼鳍足鼎等,其中的几何印纹陶是在泥质陶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而来的,最具特色^⑤。其他如竹和草的编制物、玉器等,特别是玉琮、玉璧等礼器制作精美,胜于同一时期的北方手工业^⑥。石器的制造更趋精致,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钺是良渚文化特有的器物,也是石钺中形制最先进的一种石制工具。特别是三角形石犁形器的大量出土,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已很普遍,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因水患而有局部的“文化断层期”^⑦,但从太湖流域的整体看,良渚文化并未完全衰亡,因为其后的马桥文化层

①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②《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③王德庆《从原始遗址的发现和分布试论太湖平原的海侵和成陆演变》,《吴文化论坛》(1999年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④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⑤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88—290页。

⑥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2页。

⑦参见戈春源、叶文献《吴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4页。据可靠的考古材料证明,太湖流域的良渚先民因水患而大量南北迁徙,将吴地的良渚文化传播到岭南和中原,因为此时的岭南石峡文化和中原陶寺文化遗存中突然出现大量良渚文化因素。此后不久,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基本继承了良渚文化,有有段石锛、印纹陶器等良渚文化生产生活用具遗存,“吴地文化”没有全局性地断层。

仍叠压着良渚文化所独有的印文陶器。有段石锛和几件印文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的太湖周边地区一直都有考古发现。洪水灾害只是使太湖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出现局部和短暂的断层^①。

虞舜南巡狩,将华夏文明带到太湖流域,促成中原文化与太湖流域的土著文化的初次杂交。《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②“历山”在今太湖之滨,“雷泽”即太湖的古称呼。舜因政治斗争失败而逃往雷泽,先在今宁镇地区的“历山”耕作,后至太湖以渔业为生。“虞舜”即“吴舜”,古代的“虞”与“吴”同音同义^③。《楚辞·天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吴获迄古,南越是止。”^④吴人属于炎黄部落集团,“吴”的发端十分远古,“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⑤据此可知,“吴”在“夏”之前。“勾吴”在虞舜时代发端,虞舜南巡,为太湖土著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⑥。

在中原地区的夏王朝至商王朝之间,太湖流域又有一批外来居民迁入,进入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时期^⑦。马桥文化是越文化的前身,湖熟文化的大部是由勾吴文化发展而来。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马桥文化基本上是继承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马桥文化出现了新的青铜器。湖熟文化仍以石器为主,据太湖流域的考古发掘,有段石锛仍很多,但此时青铜器也已经出现。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稻作产业的发展,稻谷为主要农作物^⑧。再从太湖流域居民早期的宗教信仰看,据考古发现,吴地有卜甲,先民用占卜决定战争等国家大事,这和商代用兽骨和龟甲占卜的习俗很相似。吴地文化与北方的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楚文化自远古到夏商,交流和传播一直未中断,周边的各种文化是吴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营养源。

二

距今约 10000 年前的太湖三山岛旧石器文化是我们目前有确凿证据的吴地最早的原始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是渔猎文化^⑨。根据已经出土的文物推断,10000 年前的太湖流域地区处于旧石器文化晚期,出土的旧石器的特点是个体小、重量轻、精致。其中刮削器数量多,特别是凹刃刮削器最具特色,是加工骨质鱼钩或木质鱼叉的理想工具。根据对三山岛旧石器组合的整体判断,这一旧石器文化反映了一种以渔猎为主的生产经济形式,采集经济似乎不占重要地位。由此可以推测出太湖流域地区的先民最早的经济形式是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在渔猎经济活动中,又以渔捞为主,狩猎次之^⑩。

距今 7000—6000 年间,太湖流域处于新石器时代早

期,此时这里属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圈。据吴县草鞋山的考古发掘,这时已经有了水稻的种植,也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开垦稻田和栽培水稻的遗址之一。从草鞋山发现的文化遗存看,人类已开始定居生活,农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仍以渔猎为主^⑪。在草鞋山遗址下层还出土了大量碳化谷粒,经科学鉴定已有粳、籼之分。稻作文化为太湖文化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苏州的草鞋山文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先生说“草鞋山文化遗址是典型的新石器文化时期的遗址,在地区考古学中属于序列较全的文化遗址。对苏州草鞋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具有很重要的考古意义,这些考证资料对建立东南考古学的分期断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东南文化考古的课题对中华文明探源工作来说非常有价值,其中,草鞋山文化对江南地区等级社会的起源与文化过渡阶段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拥有 6000 多年历史的草鞋山遗址,同样也是诸多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太湖流域远古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草鞋山遗址中 6000 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确定为人工栽

①王德庆《从原始遗址的发现和分布试论太湖平原的海侵和成陆演变》,《吴文化论坛》(1999 年卷),第 39 页。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2 版,第 3 页。

③夏代前后,北方的部落或部族如“有扈氏、有鬲氏、有仍氏、有穷氏、有熊氏、有苗氏、有巢氏”等,此时北方的“有”字与吴语的“勾”、“格”都是吴方言中的发语词。《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吴言勾者,夷语之发声。”因此,“勾吴”即“吴”即“虞”。

④⑤詹杭伦、张向荣编著《楚辞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98 页。

⑥商末,泰伯“奔‘吴’”,将中原的“制度文化”与江南土著文化杂交,“勾‘吴’文化”进一步繁荣。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⑧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 294 页。

⑨张祖方、陈淳《三山文化》,南京博物院集刊,第 9 集,1987 年。

⑩⑪陈淳、张祖方等《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报告》,《吴文化论坛》(1999 年卷),第 63—64、65 页。

培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是中国水田考古与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当时中日合作进行马家浜文化水稻田的考古,日本考古队打开堆积层,看到远古的水稻田时就震惊了,称赞这是不亚于西安兵马俑考古发现。”^①

崧泽文化时期,据吴江梅堰出土的文物中,有骨鱼镖、石制或陶制网坠,制陶技术有显著的进步。他们用鱼脊椎骨做成装饰品,陶器的饰纹中有鱼鳞纹和菱叶、菱花和菱实的花纹,还有制作精致的鱼形匕首等。吴国宝——江豚形陶壶为太湖渔文化之精品。现存的鱼形器物“江豚壶”,1960年吴江梅堰出土,整器呈江豚状即鱼形,为盛水用具,全器线条优美,为5000多年前吴江水乡文化的典型器物,极其精美珍贵,是太湖渔文化的精品。在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存中,陶器形制有圈足器、三足器居多,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的壶,有“鲤鱼跃龙门”、“年年有余”等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理想精神。“渔文化”是风俗性极强的一种文化系统,而太湖渔文化独具特色。

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已很普遍,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众多精良的农业器械也反映出良渚时期太湖流域农业的发达。那一时期,水稻是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在良渚文化的遗存中,出土很多成堆的稻谷,品种仍然是粳稻和籼稻。

虞舜南巡狩,先在今宁镇地区农耕,后至太湖以渔业为生。“虞舜”即“吴舜”,“吴”的源头在虞舜,或最迟也应在虞舜为害之后。而虞舜是“帝”,因政治避难来吴地为“农”。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太湖流域大不同,虞舜至此“以渔业为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即是对太湖渔文化的认同。

太湖远古文化的主体是渔稻文化,是建立在渔业和稻作基础之上的一种水乡文化,渔稻文化是吴文化的源头。大量的文字和实物考古发现证明,太湖流域的先民原初最有特色的生产活动一是“渔猎”;二是“稻作”。渔业和稻作都是这里最重要的原始生业,在太湖流域各地的社会经济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一万年前的三山岛文化到虞舜时代,再到夏商王朝建立之后,渔业和稻作是太湖流域先民的最主要产业。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②可见,亘古以来,渔业和稻作是太湖流域民生的支柱产业。(宋)范成大《吴郡志》也记载“吴之习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③在距今10,000年前的太湖三山岛,先民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以渔业为主的,三山岛渔文化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太湖文化的源头。在距今约7,000年前后,太湖流域水稻开始种植,稻作产业不断发展,稻谷成为当地得主要农作物^④。

渔业和水稻产业的发展,使“水乡泽国”的太湖流域逐渐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

渔稻文化,既有“文化”的一般内涵^⑤,又独具“鱼”和“米”的文化基因。因为特殊的自然环境,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条件是区域内江、河、湖、塘、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这必然决定了太湖文化的特色是“以水为本”的水乡文化,和渔业、稻作及舟楫的关系最为密切^⑥。渔业和稻作是太湖文化发展过程中最原始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太湖流域的“生产方式”、民众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以及民俗、城市建设、商贸,甚至军事活动等都有“渔稻文化”的鲜明烙印。

万余年来,特别是进入到近代,太湖流域渔业和稻作生产方式的创新既促进了渔稻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渔稻文化的繁荣。太湖流域渔业和稻作产业的主要创新有:近代渔业学校的设立,培养新型渔业人才;机器渔轮的使用,提高渔业生产效率;渔业基础设施的近代化改进等。稻作产业,唐代就开始有了稻麦复种制、江东犁的出现;明清以后又有双季稻种植。新式渔业也称为

①据当时陪同科考的原唯亭镇文化站站长沈及的口述。

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第2045页。

③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④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294页。

⑤“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

⑥“渔业”概念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最早的渔业仅限于天然捕捞。后来人类学会了人工饲养鱼类技术,渔业就增加了水产养殖的内容。随着水产加工的发展,水产加工业以及水产品运输业也被包括在渔业中,称为广义的渔业或水产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把“渔业”界定为:渔业即水产业(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是人们利用水域中生物机制的物质转化功能,通过捕捞、养殖和加工,以取得水产品的社会产业部门。它以水产捕捞、水产增养殖、水产品加工和运销等为中心,构成一个生产体系。广义的水产业包括渔船修造、渔具和渔用仪器的制造、渔港建筑、渔需物资供应以及水产品的保鲜、加工、贮藏和运销等,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渔业一般可分为水产捕捞、水产增养殖和水产品加工业。

“现代渔业”主要是指以机器渔轮为工具的捕捞作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渔业科学技术^①。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近代渔业,包括机轮渔业、群众渔业、水产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以及水产学校、水产试验场等^②,内涵更丰富。但一般意义上的新式渔业首先是指机器渔轮业。新式渔业以苏南为最早,居于江苏和全国的最前列。民国初年开始,苏南地区一些主要由中小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渔业公司成立,渔业公司的建立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巨大的进步,适应于渔业经济活动,也适应了近代渔捞技术的进步。

太湖流域的民众在万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渔文化,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生活各方面^③。这里是全国最典型的水乡,到处有取之不尽、食之不绝的各种鱼类,鱼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俗息息相关。作为“人类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鱼对人类自身的繁殖、捕捞工具的发明和使用、火的利用甚至一些族群的迁徙等,都曾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鱼既是营养丰富的食物,也是饰物、是器物、是图腾、是文化。甚至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专诸刺王僚”以“鱼腹藏剑”;吴王建“鱼城”以倡导发展渔业;明清的“鲟贡制度”等。

自从距今 7000 年前太湖流域开始种植水稻,稻作产业就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获得发展,为太湖文化增添了重要内涵,对太湖流域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太湖流域的稻作产业在全国率先产生复种制。李伯重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特别是在太湖流域的润、苏、常、湖等州。稻麦复种制是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种植制度,实行复种制,需要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与资金。而唐代的长江流域特别是太湖流域,这些条件基本都能满足。”^④而且,当时出现了江东犁,其性能更适宜太湖流域的水田使用。也有人以北宋苏州的稻麦复种制推证唐代,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物产条》,(苏州)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农民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次种焉。”^⑤双季稻的栽培较早,“江苏双季稻的栽培,在苏南地区,康熙五十五年,曾在苏州葑门外,二十四都六、七图地方也推行过。”^⑥太湖流域水稻种植,六朝以后,特别是从唐代开始,水稻生产开始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许多优质稻种,生产周期短,甚至还有三季稻的种植。

稻作产业兴盛还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如伍子胥筑姑苏城,以稻米磨成粉制成砖建造城墙,以备作战时士兵和民众的干粮之用“漕运制度”,也说明太湖稻作产业对封建政权的文化意义。“苏湖熟,天下

足”,明代苏州府占全国土地 1/90,而税粮却占全国 1/10。“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⑦

“民以食为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太湖流域的民众自古及今“食鱼与稻”,据统计,太湖流域民众的主食或副食品,75% 以上都与鱼和米相关。古人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鱼”和“米”是太湖流域的文化基因和载体。虽然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工商业、服务业等产业的繁荣,渔稻经济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比重下降了,但“民食鱼稻”的饮食习惯传承了万余年。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人的饮食习惯与性格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渔业和稻作是太湖流域民众生命力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群体的性格和独特的生命行为。“鱼”与“禾”的文化,即“苏文化”,是吴文化发展的现代阶段。

(本文为 2012 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苏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创新发展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 2012SJD770009;2012 年苏州市重大科研课题《吴文化传承与发展战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 SRD201221。)

作者简介:李 勇(1968—),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方 英

①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1 页。

②郭文韬、曹降恭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1 页。

③李勇《苏南渔业发展中灿烂的渔文化》,《安徽史学》2009 年第 4 期。

④李伯重《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1982 年第 2 期,第 65—71 页。

⑤(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 页。

⑥桑润生《长江流域栽培双季稻的历史经验》,《农业考古》1982 年第 2 期。

⑦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390),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25 页。